《日下舊聞》與朱彝尊

海諾

人與事

尋覓老北京的舊聞故影，最常見到的史料就是《日下舊聞》和《日下舊聞考》，《日下舊聞》的作者是清初著名學者朱彝尊，他寫下了這本北京史志專著，這本書是第一次系統地整理了關於北京的文獻，全書分爲十八類，有星土、世紀、形勝，國朝宮室，京城總記、皇城、風俗、物產等，全書共分爲四十二卷。到乾隆五十三年（一七八八年），寶光鼎、朱筠等在《日下舊聞》的基礎上刪繁補缺，援古證今編成《日下舊聞考》。該書仍沿用《日下舊聞》的體例和編次目錄，內容增爲一百六十卷，成爲清代官修的規模最大、編輯時間最長、內容最豐富、考據最詳實的北京史志文獻資料。

朱彝尊，清代詩人、詞人、學者，浙江嘉興人，生於一六二九年。他開創了浙西詞派，風格清麗，與納蘭容若、陳維崧並稱清詞三大家，詩也很有成就，與當時的王士禎稱南北兩大宗。在北京城宣武區海柏胡同裡，有一座年代已很久遠的院子，原爲廣東順德會館，也是《日下舊聞》的作者朱彝尊的故居，門口鑲着的石匾上刻着「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朱彝尊故居」，《清史稿》中說朱彝尊「生有異秉，書經目不遺」，明末清初，朱彝尊只有十幾歲，對清兵入主中原持對抗的態度。到康熙十八年（一六七九年），清廷舉行博學鴻詞科會試，五十一歲的朱彝尊等被錄取，其中朱彝尊、嚴繩孫、潘耒、李因篤均以布衣入選，時稱「四大布衣」，任翰林院檢討，負責編寫《明史》，康熙二十年（一六八一年）朱彝尊被授日講起居注官，後入值南書房，得到了康熙皇帝喜愛。康熙二十三年（公元一六八四年），朱彝尊開始編輯《瀛洲道古錄》，因私自帶着他的學生入內抄錄四方經書，被學士牛鈕彈劾，謫官。

朱彝尊被彈劾而降職後，住處從原來的黃瓦門遷往宣武門外海波寺街十六號，即海柏胡同，居住的院子裡曾有兩株鬱鬱葱葱的紫藤，綠意盎然，枝繁葉茂，花香四溢，朱彝尊欣然將他的寓所取名「古藤書屋」，並開始撰寫《日下舊聞》，京城的風土人情、山川地貌給了他極大的安慰，他沒有因謫官而消沉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《日下舊聞》的創作中，他白天出去探訪，走遍京城和郊野，晚上在燈光下查找史料，對照古籍，含辛茹苦，窮經皓首，詳細記載京師的地理沿革，典章制度及遺聞舊事，成爲當時最大、最完備的一部北京地方志，可謂是當時北京的風情故跡地理的宏篇巨著。也爲後人留下一部珍貴的史料。

《日下舊聞》書名中的「日下」典故，取自王勃《滕王閣序》，裡面有「望長安於日下，指吳會於雲間」句，後轉借爲京都，古代以帝王爲日，因以皇帝所在地爲「日下」，後轉借爲京都。

文化什錦

「稽古社」

言成

民國初期，是中國京劇的繁榮時期。爲了培養人才，各地都紛紛興建科班，招收學生。大大小小，數不勝數。其中，以北京與上海兩地的京劇科班最多。而鄰近京都的天津，自然也不例外。同樣，也有不少愛好京劇的實業家，先後舉辦了一批京劇科班。在這些科班中，最有影響的，當數「稽古社」。

「稽古社」的承辦者高渤海，是富商之子，頗有實力。並且，他本人愛好京劇，曾拜尚和玉爲師，能演出武戲《長坂坡》、《挑滑車》等劇，可見身手不凡。他爲了實現自己的理想，不惜花費巨資，聘請教師，招收學生，就利用天津「勸業場」的劇場，辦起了「稽古社」。聘請著名演員婁廷玉擔任正社長，韓富信擔任副社長。爲了增加實力，他還特地請前輩武生名家尚和玉擔任名譽社長。

尚和玉與楊小樓齊名，藝宗「俞（菊笙）派」。武功根底深厚扎實，表演講求氣勢。一舉一動，皆有法度。代表劇目有《四平山》、《晉陽宮》、《鐵籠山》、《艷陽樓》、《金錢豹》、《收關勝》等，演來都有自己的特色，世稱「尚派」。由於尚和玉德高望重，人緣甚佳。因此，很多梨園行的子弟紛紛參加。在此期間，高渤海還遍請名師進社執教。先後有小生程繼先傳授《群英會》、《岳家莊》；紅生程永龍傳授《鐵公雞》、《九龍口》；紅淨王福連說過《古城會》、《千里走單騎》；武生李吉瑞說過《洗浮山》。還有青衣朱琴心、鄭冰如，武生李蘭亭、侯永奎，以及前輩名丑蕭長華老先生等名家，都曾到「稽古社」說戲講課。有這些名師的教導，使學生們受益匪淺，培養出很多優秀的京劇人才。

「稽古社」中湧現出的優秀學生，有張春華、賀永華、徐俊華，李元春、李大春、郭錦春，姚承緒、鈕承淮、郗承鸞、劉承鶴、戴承萬、李承斌、張承鳳等。都是相當有水平的人才。由於尚和玉的指導與傳授，「稽古社」的武戲演出特別精彩。如《武松》、《林沖夜奔》、《乾坤圈》、《李元霸》、《七擒孟獲》、《粉妝樓》、《鐵冠圖》、《白泰官》等，都是觀衆喜歡的好戲。

「稽古社」的學生，年輕有爲，藝術水平較高，獲得天津觀衆的好評，從此，就在天津站住了腳，長駐「勸業場」，每天正常演出。

「王孫今又歸」

黃元

文史叢譚

二〇一一年秋，中華蟋蟀第一縣的山東德州寧津舉辦第五屆「中國甯津蟋蟀文化藝術節」，再一次吹響寧津蟋蟀品牌，成爲國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。

其實，始於二〇〇三年的上海崇明森林旅遊節期間，深受人們喜愛的「上海綠華全國蟋蟀大獎賽」，也是十分奪人眼球的。來自全國各地的「追蟲族」們，興致勃勃聚集「蟋蟀大獎賽」舉辦地的綠華鎮「促織園」：或率「強兵悍將」闖入「沙場」廝殺拚搏，冀圖一舉奪魁，或全神貫注觀摩蟋蟀比拼，尋求精神刺激……

蟋蟀，是人類最早認識的昆蟲之一，與人類關係至爲密切，但凡有人居住之處，皆有蟋蟀生活着。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《詩經》中就已經出現了蟋蟀的蹤影：「五月斯螽（蠾蠾）動股，六月莎雞（紡織娘）振羽……十月蟋蟀，入我床下。」（《豳風・七月》）「蟋蟀在堂，歲聿其逝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邁。」（《唐風・蟋蟀》

自然界常見的鳴蟲三十餘種，善鳴好鬥的蟋蟀「名列前茅」，被譽爲「天下第一蟲」，歷代詩人多有吟詠：「獨申旦而不寐兮，哀蟋蟀之宵征」（先秦・宋玉）；「明月皎皎光，促織鳴東壁」（《古詩十九首》）；「西窗獨暗坐，滿耳新蛩聲」（唐・白居易）；「蟋蟀獨知秋令早，芭蕉下得雨聲多」（宋・陸游）；「青燈照夜梭，蟋蟀窗外語」（元・趙孟頫）……

蟋蟀有許多別名。幽州（河北一帶）人呼作「促織」（「趨織」）；北京人稱爲「蛐蛐兒」；蘇滬等地則叫做「賺績」。奇怪的是楚（湖北）人稱蟋蟀爲「王孫」，就有點讓人摸不着頭腦了——

宋代詞人李重元四首憶王孫小令中的春詞：「萋萋芳草憶王孫，柳外樓高空斷魂。杜宇聲聲不忍聞。欲黃昏，雨打梨花深閉門。」詞中「王孫」當爲皇族子弟無疑。而袁瓘《秋日詩》中「芳草不復綠，王孫今又歸」中的「王孫」，卻指的是「蟋蟀」。對此，京城三大才女之一、《讀書》四大金釵之一的揚之水（趙麗雅）作如是解：宋無名氏作《謝氏詩源》有「王孫」一條云「袁（按：袁瓘，唐人）《秋日詩》曰：『芳草不復綠，王孫今又歸』人都不解，施蔭（按：宋人）見之曰：『王孫，蟋蟀也』」，並引《爾雅・釋蟲》謂幽人稱蟋蟀趨織，楚人稱之爲王孫。

嗣後，「王孫」便成了詩人們吟詠蟋蟀的專用詞語了：王維《山居秋興》：「竹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。隨意春芳歇，王孫自可留。」白居易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：「遠芳侵古道，晴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孫去，萋萋滿別情。」詩中「王孫」皆喻指蟋蟀。

上海松江區七寶鎮蟋蟀，以強健剽悍、驍勇善戰風光一時、蜚聲滬上；如今七寶鎮已經城市化，遍地鋼筋水泥，蟋蟀無處藏身，漸趨式微。崇明綠華鎮（上海唯一一方淨土）蟋蟀由是取而代之、獨步申城；綠華鎮已成上海唯一蟋蟀培養基地：闢瓜田、墾豆地，供遊人捕蟋蟀；建「促織園」，每於「白露」之後，組織鬥促織賽事。

綠華鎮「促織園」位於綠港村「西來農莊」內，佔地一百四十六畝。除蟋蟀培訓基地外，還闢有玫瑰園、果園、魚塘、苗圃。步入其內，感覺空氣清新、靜謐安寧。園內兩組建築群，紅瓦青磚、古色古香，典型的江南水鄉明清民居建築風格。

蟋蟀生於淺草叢泥中者，性情溫和，拙於爭鬥；而綠港村的蟋蟀，多長於亂石堆間、雜草叢中，觸鬚長、後腿粗壯，善於跳躍，極擅爭鬥。蟋蟀蓄養與比賽用「三盆」：蓄養用「養盆」，高三四寸，直徑四五寸，呈圓柱形、六角形或鼓形；攜帶用「起盆」，小於「養盆」，盆壁有小孔，便於將蟋蟀引入「鬥盆」；比賽用「鬥盆」，略大於「養盆」，以細砂泥搪底，使之粗糙不平，以利蟋蟀咬鬥時蹬踹發力。

觀看蟋蟀競技不啻是一種精神享受：蟋蟀進入鬥盆，彼此以觸鬚小心刺探「敵情」，猝然相遇，或牙對牙互試功力，或頭對頭相互「爭項」；忽而咬抱嘶扯獅子滾繡球，忽而餓虎撲食按敵於盆底。古代文人雅士歸納蟋蟀有「五德」：「鳴不失時，信也；遇敵必鬥，勇也；傷重不降，忠也；敗則不鳴，知恥也；寒則歸守，識事務也。」信哉，斯言。

鬥蟋蟀之風，始於唐、著於宋，盛於明清。歷代詩人爲蟋蟀爭鬥，留下了諸多精彩篇什。宋・張鎡《滿庭芳・促織兒》：「兒時曾記得，呼燈灌穴，斂步隨音。滿身花影，猶自追尋。攜向華堂戲鬥，亭台小，籠巧汝金。」明・高承埏《蟋蟀賦》：「招朋偕侶，消暇乘閒。依稀乎命帥出境，彷彿乎拜將登壇……其形昂若，其聲黯然。見形而鬥志遂起，聞聲則雄心各前。張牙耀刀，豎鬚矗杆；挺翼直接，拔足爭先；一進一退，載合載旋……」

可惜這種鬥蟋蟀的娛樂，在其發展過程中，逐漸演變成了賭博活動。古書記載：「立秋促織鳴」（《詩緯》）、「蟋蟀俟秋吟」（《資治通鑒》）——蟋蟀的鳴叫，好像是下「戰書」。入秋後，「秋樓」（鬥蟋蟀場所）內張掛「報條」（類今之海報）：「某處秋興（鬥蟋蟀）可觀。」於是，人們湧向「秋樓」，看鬥蟋蟀去了：「持促織而往者，各納（放入）之（蟋蟀）於比籠」，議定輸贏金額後開鬥。

鬥時以蟋蟀草（俗名「蛐蛐探子」）撩撥蟋蟀，招其發怒爭鬥。「促織勝，主勝；促織負，主負」。勝出的蟋蟀，「鼓翅長鳴，以報其主」；主人將小紅旗插於比籠，好像是授予牠一枚勳章。蟲兒雖小，輸贏卻大，因鬥蟋蟀而傾家蕩產者，屢見不鮮，蒲松齡名篇《促織》中所述成名之遭遇，即爲一例。

從燕山到嶺南，從吳越到巴蜀，不管皇宮深院，還是市井民間，無論膏粱紈袴，抑或浪蕩子弟，都喜歡鬥蟋蟀賭輸贏。南宋權佞宰相賈似道是一位「蟋蟀專家」，元軍兵臨城下，仍與群姬在葛嶺半閒堂玩樂，沉迷鬥蟋蟀不醒，人呼「蟋蟀宰相」。倒是他寫的一本《蟋蟀經》，對蟋蟀的捕捉、識別、飼養，論述至爲詳備，品蟋蟀優劣謂「白不如黑，黑不如赤，赤不如青麻頭」，文字簡潔，見解精闢，成爲明・袁宏道、清・朱從延、近人李石孫著述《促織志》、《王孫鑒》、《蟋蟀譜》的珍貴參考書。

今天的蟋蟀大獎賽，與昔日的鬥蟋蟀，不可同日而語。社會輿論的正確引導，確保了「上海綠華全國蟋蟀大獎賽」年復一年的健康開展，至今已歷十二屆，充實和豐富了海島人民的文化生活：「聽其鳴，可以忘倦；觀其鬥，可以怡情。」

人們來到這裡，除可領略蟋蟀爭鬥的驚心動魄外，還可享受捕「蟲」之樂趣——

晚間，打着手電筒來到田間，滿耳是「田園歌星」們的悅耳歌聲：「瞿，瞿瞿」，恬然自得。蟋蟀「田園歌星」之令譽，並非浪得虛名：發育成熟，演奏「暢想曲」；雌雄相遇，彈奏「求偶曲」；戰鬥獲勝，高奏「得勝曲」——你循聲尋覓，或許還能捕得一、兩頭價值不菲的崇明綠華蟋蟀呢！「王孫今又歸！」歡迎你來崇明綠華觀看蟋蟀大獎賽。

域外漫筆

倫敦動物園

悠悠

在倫敦的時候，一天，與倫敦動物園（London Zoo）擦身而過，從園外拍攝了園內兩隻長頸鹿的鏡頭。牠們一隻看天，一隻望地，眼溜秋波，良久仍慣於這般姿態，沒多少改變。即便動作不多，也並未有顯出不自由之勢。但見牠們優哉游哉，好像就是被困在園內，也並未感到不自由似的。

香港的動物園，即使位處鬧市，內裡的動物，卻被藏起來，躲在動物園的角落。參觀者到來，大有「探監」之感。基於安全理由，人與動物不能太接近。在倫敦動物園外圍，卻不難看到園內動物。就在大馬路車來車往的邊緣，園內滿是動物，園內園外，人與動物不至太疏離。動物慣於與汽車打交道，煞是有趣。

倫敦動物園佔地三十六英畝之廣，有七百多個動物物種，收藏量是全英之冠。這個被攝政運河（Regent's Canal）穿越的大型動物園，爲世上最古老的動物園，始建於公元一八二八年四月。附近旅遊景點中，攝政公園（Regent Park）最爲接近，只有零點六三公里之遙。其他如福爾摩斯博物館（Sherlock Holmes Museum）、杜莎夫人蠟像館（Madame Tussauds），距離動物園也有一公里開外。攝政公園內裡，一望無際的錦簇的繁花，細緻地分門別類，與倫敦動物園互相輝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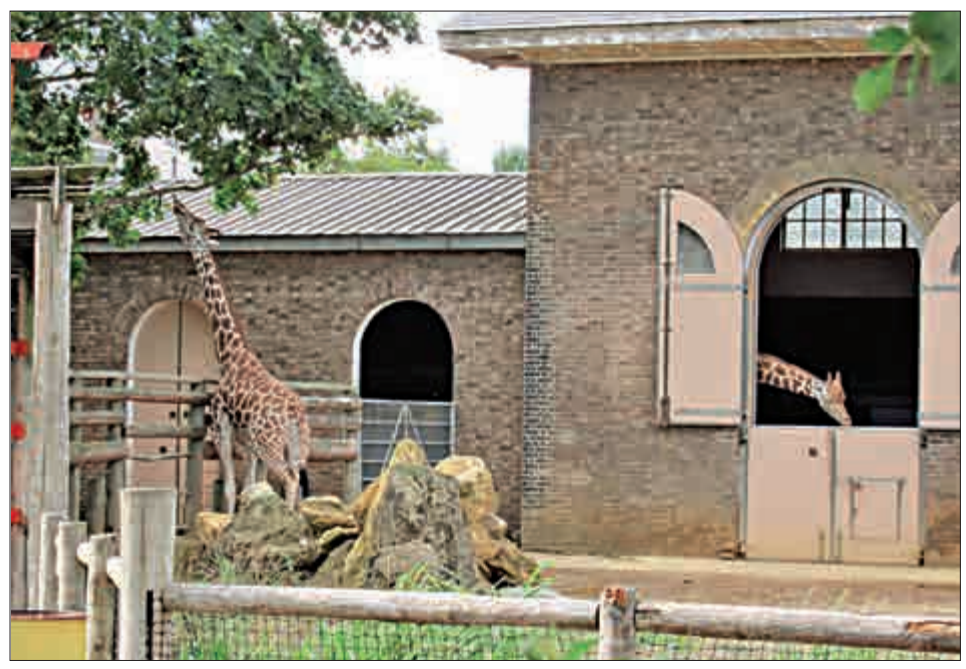
倫敦動物園與攝政公園之間，在攝政運河上，停泊了一艘古色古香、輕妝軟扮的中國畫舫，那是一間中國餐館。

古詩詞中不乏「畫舫」句：宋辛棄疾的《滿江紅・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》詞就有「料想寶香黃閣夢，依然畫舫清溪笛。」畫舫，這詞兒很雅。香港於上世紀六十年代，「畫舫」名鵲起，與美味海鮮相關。沙田畫舫，一九六三年起停泊於新界沙田近沙田墟一帶，吸引異地遊客之餘，港人到沙田郊遊時，也多順道光顧畫舫。那時的沙田仍是郊區，後來發展新市鎮，必須填海，畫舫才於一九八四年結業。一九八六年，敦煌酒樓在沙田城門河畔興建另一艘敦煌畫舫，後來改爲明星海鮮舫，取代沙田畫舫。此伏，彼起，香港的畫舫也可說歷盡滄桑。

畫舫食肆，雖不是眞船，卻能讓居中食客悠然地邊看海景邊嘗美食，遇上風靜月明時，更感舒泰。如此讓食客暫忘煩囂，在當時來說，倒是餐飲業的一大特色。起初有此意念者，本身就應是個詩情畫意的人。倫敦攝政運河上的中國畫舫，意念想必也來自香港的沙田畫舫。

那天在天橋上眺望，倫敦動物園、攝政花園之間就有此畫舫。這邊鬧市車水馬龍，那邊則是平靜景致，蘊含於其中的一種寓意，似乎是：要獲取靜逸，全在於心境。自尋煩惱者，心中老是憂煎，就算人在深山，四下渺無人煙，內心也會忐忑不安。相反，人心先安靜，即使在鬧市，喧囂在側，也聽而不聞。

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倫敦動物園也曾一度面臨困境。動物園由於收藏了甚多動物物種，財政是一個大問題，在一九八〇年代曾一度因收支不平衡而面臨關閉。但當動物園宣布將在一九九一年關閉時，訪客和捐贈驟增，動物園又轉虧爲盈，得以繼續經營下去。



倫敦動物園內的長頸鹿　悠　悠攝

一隻手

流沙

人生在線

他只有一隻右手，左手在小時候一次玩耍中，觸到了高壓線燒焦了。他的這隻右手，承擔了兩隻手的功能。

三年前，他想進一家工廠打工，老闆看他只有一隻手，問他能不能幹活，他爬上了行車，熟練地操作起來。後來，他就成了這家工廠的一位行車工，他開的行車又快又穩。

但是，不幸發生了。一次檢修設備，他正在清理行軌道，一位不知情的工人合上了電閘，行車突然啓動起來，輪子硬生生從他的右手上軋過，他的五個手指鮮血直流。他被送到醫院，因爲手指傷勢嚴重，五個指頭都沒保住。

一個月後，他出院了。他要求賠償，老闆說可以。但只能按照傷掉五個手指的標準來賠。

他說這樣不對，他的右手相當於兩隻手，要賠得按照兩隻手的標準來賠。老闆不答應。

這事就走上了法律程序，對於他的右手到底按怎樣的標準來賠，結果法官也莫衷一是，有的說要按兩手的標準來賠，有的說只能按照一隻手的標準。後來判決下來了，按照傷殘一隻手的標準賠償。

這樣的賠償，已經到了可笑的地步。我們都是正常人，都有兩隻手，我眞的希望我們的一隻手除了能爲自己，也要騰出一隻手幫幫別人。

古城西安攬勝

葉周

文化經緯

唐代的惠恭大師和金代的法爽和尚，都是在佛門已經修行到了最高境界，然後積火自焚，煉出舍利，以身獻佛。

良卿法師卻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焚之舉震懾紅衛兵的暴行，達到保護佛門珍寶的目的。如果說西安土地上的珍寶歷史上無數次被偷被盜，已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，那麼那批紅色暴民的衝擊將更具毀滅性。

良卿（一八九五至一九六六），俗名戚金銳，法名永貫，河南省偃師縣人，清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四月十三日生。曾先後主持普陀山文昌閣、寧波觀宗寺、上海福緣寺等名寺，於一九五三年到法門寺住住持。

一九六六年「文革」發生時，衝進法門寺的紅衛兵，不知他們年輕的腦袋中何來如此的忽發奇想，將日常生活所耳濡目染的輿論宣傳隨處嫁接，要在佛祖的安息之地挖出秘藏的蔣幫電台。他們先在寺廟中隨意敲砸，又踩踏着碎裂一地已成廢墟的古物向寶塔進攻。他們在塔基下瘋狂地挖掘，企圖掘開通向地宮的通道。

良卿法師並不清楚地宮下究竟有什麼物品，但是他清醒地意識到先人流傳下來的珍藏一定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，他不能讓眼前的慘象進一步無限制的發展。天底下似乎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以革命名義進行破壞的暴徒，唯有以他的老弱之身做驚世之舉方能給以震懾。

良卿法師拖着疲憊的腳步，回到方丈室，從一個樟木箱內，取出了代表寺院住持方丈尊嚴與權威的五色木棉袈裟，將它披在身上。平時這件袈裟只有在莊嚴的大法會上才會使用。隨後他來到大殿的香案前，大殿裡的釋迦牟尼佛祖像已被砸得碎裂一地，肢體不全。他將大殿內平時用於照明的一小桶煤油，淋在身上，並從香桌上取了盒火柴，往殿外走去。

隨後他又到柴房抱了一小捆柴草，來到寶塔旁，將柴草鋪在地上。此時已雨過天青，良卿法師望着寶塔，口中念着佛號，在柴草上坐定，他十分依戀地望了寺廟最後一眼，毅然擦着火柴，點燃柴草。

柴草迅速燃燒起來，火苗躥上了浸泡了煤油的袈裟，瞬間烈焰纏緊了良卿法師的身體。我曾看到一幅良卿法師自焚的照片，當烈焰在他身體周圍飛舞起來時，良卿法師身體堅挺，腰板筆直，頭顱高昂，目光堅定地望着前方。臉上沒有絲毫畏懼和痛苦的怯懦，卻顯得那麼神聖和威嚴。良卿法師以死相爭，時年七十一歲。也正是良卿法師的壯烈之舉震懾了紅色暴力，保住了法門寺地宮中的寶藏，其中就有日後發現的釋迦牟尼佛祖的眞身舍利。

面對良卿法師自焚護塔的悲壯行爲，紅衛兵們嚇得目瞪口呆。法門寺大法師被迫死了的消息，迅速在周圍的村鎮中傳開，良卿法師的信衆們難抑憤怒的情緒，紛紛舉起鋤頭、棍棒，擁向法門寺，向逼死老法師的人討還公道。紅衛兵們落荒而逃。

法師焚身數日後，他的弟子張政華居士（紹祥）不避危險將良卿法師的遺骨送到賢山寺交靜一裝藏。靜一又交給白龍村吳七老居士轉送至長安終南山上天池寺安葬。一九九四年，法門寺在中觀山建造了普通塔院及歷任高僧靈塔，靜一率來正等迎取良卿法師骨灰回寺供奉。一九九七年農曆七月十二日，良卿自焚殉教三十一周年，法門寺舉辦良卿法師靈骨入塔法會，如法供奉良卿法師遺骨入塔，供後人千秋萬代永遠紀念。

劫後餘生的法門寺經歷了「文革」的動盪，經年失修，在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子夜，一聲轟然巨響，屹立千年的法門寺眞身寶塔突然崩塌。後來在重修寶塔時發現了地宮，在沉寂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之後，二千四百九十九多件大唐國寶重器，簇擁着佛祖眞身指骨舍利重回人間。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至十二日期間從地宮中共發現四枚舍利。其中兩枚爲白玉所製，另一枚爲一高僧的舍利。這三枚都屬於「影骨」，和「靈骨」放置在一起是爲了保護後者。「靈骨」色黃而有似骨質的顆粒分泌物，經專家鑑定，這一枚就是眞身佛骨。法門寺也隨着眞身舍利的出土而成爲佛教聖地。

那時距離良卿法師自焚護法已經二十一年。可是沒有人會忘記，如果不是良卿法師的捨己英勇行爲，這些珍寶也許早已灰飛煙滅於「文革」的熊熊烈火中。我在西安不僅看到了古代文明的輝煌，更看到了這些文明的結晶在現代社會蛻變中經歷的磨難。這些倖免於難的珍寶，現在安放在布置典雅的珍寶館中，向參觀者展示着不凡藝術價值的同時，始終也在提醒着人們，文明的延續是多麼艱難，多少志士仁人爲了保護遠古的文化奉獻了自己的生命。

（下）